
豫湘桂会战之黔南作战

李 刚

为了打通纵贯中国的“大陆交通线”，摧毁中美空军在华中、华南的基地，援助孤军深入缅、泰、越地区的日军，保住必要时由大陆经朝鲜撤兵的最后通道，并“确保中国东海的海上交通”^①，1944年3月10日，日本大本营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制定了“一号作战计划”；旋即发动了“一号攻势”。这次攻战后期，1944年11月28日，日军一部开始侵入贵州，先后攻占荔波、三合（三都）、独山、八寨（丹寨）等县，前锋进逼都匀姬家桥，造成贵阳危急，重庆震动。十几天后，日军主动退出黔境，极度紧张的形势开始缓和下来。在这次黔南作战中，日军（第六方面军第十一军）对贵州的进攻，是一次冒险的孤军深入。日军这次行动的动机，速进速退的原因以及中国军队在这次作战中的表现，都有值得研究的地方。但目前史学界对这次作战却缺乏研究。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工具书中，关于这次作战的介绍，200字左右的短文，就出现了7处错误。本文现就日军入侵贵州和迅速撤出贵州的原因及动机，中国军队的防卫战略及抗击作战情况作一粗略的分析。

在日本“一号作战计划”及第六方面军的作战方案中，进攻贵州并未被考虑进去。然而，1944年11月28日，第六方面军第十一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广西会战》（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军却孤军冒险进入贵州，其原因何在？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六方面军在“一号作战”第二阶段第二期作战（即桂柳会战）中的作战意图。

1944年日军进攻豫湘桂的作战目的主要是：“击败敌军，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域，摧毁敌空军主要基地，同时摧毁重庆政权继续抗战之意图。”^①第六方面军在进入第二期作战之后，正是以此为宗旨来制定作战计划的。综合当时的形势，对于第六方面军来说，“与其说是在于攻占桂林、柳州两个城市，莫若说在于捕捉面前的敌军主力以及攻占桂林、柳州附近后敌人的反击”。^②因此，11月11日相继攻克桂林、柳州之后，如何追击中国军队的主力以及追击到何处，成为日军的一个突出问题，而它又与当时的整个战局关联着。从战争的全局看，在太平洋方面，6月到7月间，盟军占领了塞班岛、提尼安岛和关岛，突破了日军的“太平洋防波堤”——马里亚纳群岛，10日，又在莱特湾海战中取得巨大胜利；大陆方面，7日，日军冒险发起的英帕尔作战，以惨败而结束，这使缅甸方面的战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此，梅津美治郎曾指出：“缅甸方面是南方圈西翼的屏障，必须击败进攻的敌军，固守主要地区，通过控制这一切断中印联系的战略基地，再与控制中国西南方面的主要地区相结合，使之共同构成保卫印度支那安全的前哨地区。”^③这样，中国派遣军尽快确保与南方军陆上联系的问题，变得日益紧迫。日战史记载：早在10月上旬，第六方面军就认为：“战略追击从作战目的看来无此必要，且也无此余力。”^④“攻占柳州后重庆军主力逃跑时应如何追击，除考虑我后方可能使

①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页。

② 服部卓四郎：《东亚战争全史》（四），禹硕基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56页。

③ 《东亚战争全史》（三），第1157页。

④ 《广西会战》（上），第121页。

用的兵力及重庆军后方的状况外,并需同时考虑打通粤汉线、攻占南宁等计划,将战场追击稍加扩大,控制在广西省的重要地区,特别要尽可能深入占领黔桂铁路。在此原则下,大致规定追击到广西、贵州省界。此时未考虑向贵州省内深入追击,因为从当时的补给能力考虑,那几乎是不可能的”。^①具体到第十一军,由于方面军预定要抽调其两个师团(一个调到法属印度支那,一个调到第二十军),所以它的“追击兵力最多只有两个师团,进行深入追击至为困难”。^②鉴于以上因素,11月15日方面军发布命令,确定第十一军“大致应追击到广西和贵州省的省境线”。^③

由上述可见,第六方面军在作战计划中,并没有突进贵州的意图。而后来攻入贵州的第十一军,在11月28日之前,也基本是遵照方面军的意图进行追击的,甚至在28日当天,第十一军还向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村报告说:“追击停止,并已返防”;方面军则“与之联络,令其尽速撤离黔桂铁路线,将来主防线大致应在柳州、宜山一线,并需将一部兵力配置于黔桂省境,担负阻击任务”。^④

然而,第十一军的实际行动却与“并已返防”的报告大相径庭。11月27日,该军第三师团第五中队于15时攻入黔桂边隘黎明关,随即进入贵州省境,向板寨追击;第二十三师团第一四联队于11月28日11时30分占领南丹后,当天黄昏继续向独山追击,沿公路经小场前进;步兵第一一六联队于11月28日进入南丹后接到师团来电,命令其应超越第一四联队,向独山追击。至此,第十一军把战火烧进了贵州省。

那么,第十一军为何要越出方面军的意图,孤军冒险进入贵州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① 《广西会战》(上),第119页。

② 《广西会战》(上),第119页。

③ 《广西会战》(下),第157页。

④ 《冈村宁次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0页。

第一，湘桂战役以来，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助长了日军进攻的气焰。特别是以横山勇中将为司令官的第十一军，“经半年作战连下长沙、衡阳、桂林、柳州等名城，势如破竹”^①，以致在桂柳会战中敢于轻敌冒进。据日本军史著作记载：“原先第十一军在制定进攻桂林、柳州的作战计划时，是按分别进攻两地的计划进行准备的，但鉴于前面的敌人，特别是柳州的守备力量薄弱和我军的实际情况，乃于11月3日改变计划，决定在进攻桂林的同时进攻柳州。”^②第十一军在短短几天内冒险成功，占领了桂柳。而在日军凌厉的攻势下，中国军队则十分混乱。按照服部卓四郎的描述，日军攻占了桂柳后，“面前的敌军出现了大混乱，特别是由于我军夺取了柳州，重庆政权大为动摇，而当第十一军果敢地向贵州省境追击时，甚至传说敌方重庆有迁都之说，战场附近的敌人惶惶不安。广西省内的敌军组织一时陷入完全混乱的状态”。^③面对如此孱弱的敌人，如此顺利的进军，日军又怎么会不贪恋成果的扩大呢？

第二，贵州是陪都重庆的一道屏障，入侵贵州是第十一军由贵州进攻四川的一次尝试。进攻四川是日军向往已久的事。日军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有了这一企图。日军大本营认为那时是进攻四川的好时机。后来由于东南太平洋战局的逆转，日军又认为计划1943年春由晋南、宜昌两个方向进攻四川的战略构想应该缓行。1944年，“支那派遣军总部曾想利用‘一号作战’的成果，进攻四川，但是进攻的方向如何——从西安、汉中南下？或沿长江西进？或从贵阳北攻？一时很难决定”。^④1944年6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曾一度研究过进攻四川的问题，当时的总司令官畑俊六认为，“一号攻势”给中国的打击，需要一年后才能恢复，同时预料日本在全盘

① 姜克夫编：《民国军事史略稿》第三卷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44页。

② 《东亚战争全史》（四），第1357页。

③ 《东亚战争全史》（四）第1358页。

④ 吴湘相：《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台北综合月刊社1974年版，第1124页。

战局中将日趋不利,所以“宜在一号作战结束后尽速攻重庆”。^① 桂柳会战,日军进展顺利,中国军队又极其混乱,所以有理由推测,第十一军正想利用这一机会,尝试从贵州北攻四川。实际上,第十一军的确在这方面作了努力,而且也得到了第六方面军统帅的肯定。冈村宁次在离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的时候,曾通知第十一军新上任的司令官上月中将:“鉴于此次作战(指进攻贵州)的战绩,希望对第三师团、第十三师团使用驮马大胆进攻的机动距离加以研究。”^② 稻叶正夫认为,这就是冈村宁次考虑“出击四川问题”的征兆。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如果日军要从贵州进攻四川的话,运输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而驮马恰好可以解决这问题。一方面,黔边山岭重叠,汽车运输极为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太平洋方面的战局”,“预定由南方补给中国派遣军的约四万千升的液体燃料,几乎无法取得”^③,故而,以驮马代替汽车是必需的。

第三,黔桂军队作战能力差,为日军的进攻提供了可能性。抗战后期,中国军队在西南大后方的广西和贵州,兵力都很薄弱,这与蒋介石派杜聿明的第五军,甘丽初的第六军等部进入缅甸,成立远征军有关。当时,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曾建议“将在缅甸作战之五个中国师抽调两个师返国阻敌”^④,即是有见于此。在整个桂柳会战中,中日双方的兵力对比是:中国陆军总兵力为“32个师,桂绥纵队2个纵队(4个团),战车1个营(属第四十八师),独立炮火约3个团,及其他零星部队,总兵力约100000人”。但“参战部队多数系参加长衡会战后损失巨大,未及补充,故若干军之人数有仅及二至三千人者”^⑤,且“在万山丛林中转进,重武器几损失殆

① 吴湘相:《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第1124页。

②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297页。

③ 《东亚战争全史》(四),第1356页。

④ 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第9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2425页。

⑤ 同上书,第2347页。

尽”。^① 而日军有“9个师团,2个独立旅团,独立战车1个联队,独立野战重炮1个联队,总兵力约110000余人”;且“此时之编装,虽已不如往昔,但日军节节进迫,其装备之损失,自属轻微”。^② 中日双方相比较,“双方之战力比,最高约为一与三之比,换言之,仅以人数而言,相差不大,虽中国空军优势,但国军战力约为日军三分之一”。^③ 故而,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在向上呈报柳州敌情时,哀叹道:“本战区兵力虽号称九个军,类皆久战之余并转战数千里,每军兵员均仅及四分之一,疲敝已极,殊恐难负重任,尤其士气不振,一般缺乏信心,虽厘订缜密计划,而实施者每难应弦符节,殊感焦虑”,“弹药之屯储亦相差甚距”。^④ 所以张发奎早在11月17日就断言:“倘敌因此扩张战果迫近黔疆,亦非绝不可能。”^⑤

另外,为了“确保黔边,屏障陪都”,蒋介石任命在豫南作战时望风而逃的嫡系将领汤恩伯为黔桂边总指挥,入黔指挥贵州的防御。其时,调入贵州的部队有汤恩伯及胡宗南的第九十四、八十七、二十九、九十八、九、十三、五十七、九十七等8个军。由于这些部队连续经历豫中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未得整补,装备较差,因而战斗力也很弱。以其中的第九军而言,1944年9月26日,白崇禧曾经请求军事委员会空运第九军第四十二师赴柳,而军事委员会则认为:“九军四十二师豫战损失甚重,九军仅五千余人……非经相当时间整补,无作战力量。”^⑥

南丹失陷前,汤恩伯主力尚在马场坪集结,不敢积极进至黔边。当张发奎、杨森率部退入黔境,日军占领黔桂边境的六寨后,汤恩伯表示他根本无法抵抗,失败是注定了的。遇到这样乏力的部

① 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第9卷,第2348页。

② 同上书,第2348页。

③ 同上书,第2348页。

④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二),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1年版,第668页。

⑤ 同上书,第669页。

⑥ 同上书,第666页。

队,这样怯懦的统帅,一二十万军队亦是形同虚设,对日军构不成太大的威胁。无怪乎连陈诚也对外国记者称:“因为我们在黔省部队的空虚,遂引得敌人深入黔境。”^①

对于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通过桂柳会战,日军也有所了解。冈村宁次回忆:“交战后感到敌军士气和战斗力素质下降”,“目前六个军的实有战斗力只相当于一个完整军”。^②正是对中国军队有了如是认识,第十一军才敢于孤军深入,冒险突进贵州。

第四,第十一军进攻贵州,也同其司令官与第六方面军统帅部之间存在矛盾有关。第十一军的司令官横山勇中将,是一位能干而自信的将领,被视为“同期中的佼佼者”。^③1944年7月底,当中国派遣军就准备设置第六方面军征询第十一军的意见时,十一军司令部曾认为,“可将第十一军升格为方面军,改编成两个军”^④,而且认为:“第十一军的升格,当然横山司令官升为方面军司令官最为适宜。”^⑤然而等到8月下旬发布第六方面军战斗序列,方面军的司令官却是冈村宁次大将,统率“目前直接担任湘桂作战的第十一军、第二十三军两个军和防卫武汉附近的第三十四军,并以预定配备于所辖区的长沙、衡阳地区的第二十七、第四十、第六十四和第六十八师团等由方面军直辖”。^⑥第十一军及横山勇对于设置第六方面军并想在其中起统帅作用的心情是比较迫切的,然而得到这样一个结果,无异于头上被泼了一盆冷水。于是,在以后的作战中,第十一军与第六方面军甚至与中国派遣军多次出现了作战意图上的抵触。

早在进入广西之前,第十一军就曾违背过方面军的意图。攻占

① 陈诚招待外国记者谈话,《大公报》,1944年12月10日。

②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290、291页。

③ 《广西会战》(上),第113页。

④ 《广西会战》(上),第107页。

⑤ 《广西会战》(上),第107页。

⑥ 《广西会战》(上),第112页。

衡阳后，中国派遣军原本想让十一军驻扎在该地附近，恢复战斗力，作好第二期作战的准备。然而第十一军却擅自攻占了祁阳、零陵，并推进到全县、道县一线。第十一军的这一举动违背了方面军的基本方针，当时的参谋副长天野少将回忆说：“在这个意义上，第十一军挺进全县，实在使人为难，但方面军也不能立即予以处理，只有顺应情况的发展，再无他法。”^①对第十一军的行动，中国派遣军再三采取制止措施，但终归无用。“当时不用说中国派遣军参谋部，而且就连总司令也不满意，有时甚至有不愉快的印象。”^②

在攻打柳州的时候，第十一军又采取了同样的行动。10月下旬，第六方面军向第十一军和第二十三军下达了对桂柳发动攻势的命令：“一，第十一军于11月3日自全县、道县一线出发，攻占桂林，然后策应第二十三军攻占柳州，当进攻柳州时，不必计较城镇的攻占，而应将军队主力由柳州北部地区向柳州西部地区的背后深入突进，结合第二十三军的进攻，捕捉、歼灭敌军主力；二，第二十三军于11月3日以后，从三江墟、桂平一线出发，以一部攻占柳州，以主力突进柳州西北地区，与第十一军相策应，捕捉、歼灭该地区的主力”。第六方面军估计，当攻占柳州后追击逃走敌军主力时，在当时情况下突进到贵阳附近是不可能的，因此预定大致以贵州省境一线为目标。”^③对于两军的策应，是以第十一军为主体的，“但从各方面军统帅的立场以及攻取柳州时捕捉重庆军考虑，则是给第二十三军以立功的机会”。^④按照方面军的意图，第十一军应当先攻占桂林，尔后以主力突击重庆军的背后，策应第二十三军。但11月3日，十一军却改变了作战计划，在进攻桂林的同时进攻柳州。横山勇也想到过，“军如今下此决心，也许违背方面军的意

① 《广西会战》(上)，第115页。

② 《广西会战》(下)，第6页。

③ 《东亚战争全史》(四)，第1356页。

④ 《广西会战》(上)，第119页。

图。^①然而，横山还是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做了，并向中国派遣军和大本营发送了作战计划。横山的举动激怒了方面军，“当时冈村方面军司令官及属下甚为惊讶，方面军对此极难采纳”。^②宫崎参谋长认为：“这是第十一军的自私，是破坏方面军拟由第二十三军攻占柳州，使之获得立功机会的统帅意图的手段。”天野副长则说：“又这样干了！这是第十一军的专横！是对方面军统帅的侵犯！”^③此外，十一军直接向中国派遣军及大本营发送作战计划也使在作战指导上重视统帅系统的宫崎参谋长感到愤慨。根据宫崎参谋长和天野副长的报告，冈村方面军司令官当场断言：“这是越权！”并急令十一军改变部署。然而十一军却以一种反驳的口气拒绝了方面军的命令，以致宫崎参谋长认为：“旭（第十一军代号）司令官的动机颇有疑问。”^④第十一军这一举动的结果，不但引起了方面军的极大反感，而且还逸失了围歼中国军队的机会。^⑤后来，冈村宁次批评说：“此次作战，旭司令官混淆统帅与战术思想，有欠妥当”，“旭”军“贪恋城市，争先攻入的倾向仍未消除”。^⑥

第十一军对方面军也有不满，这一点，方面军已有察觉。冈村鉴于前线的状况为进行重要联络和指挥作战，曾向柳州派出情报所，以天野副长为首，片山、东参谋同行。天野副长通过与第十一军的联络发现，“在‘旭’司令官的态度和言谈中，流露出不满情绪”。^⑦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自从第六方面军成立之后，第十一军与方面军之间在战略思想上一直有矛盾。11月28日第十一军越出方面军的意图冒险进入贵州，是两者矛盾的又一次体

① 《广西会战》（下），第81页。

② 《广西会战》（下），第83页。

③ 《广西会战》（下），第88页。

④ 《广西会战》（下），第89页。

⑤ 《抗日御侮》第9卷，第2432页。

⑥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297页。

⑦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291页。

现。

第十一军对贵州的进攻是迅速的,撤退也是迅速的,其在黔省前后不过半个月时间。那么,为什么第十一军正在迅速进军的时候,又突然停止进攻,匆匆退出贵州呢?有些学者认为,这是由于“日本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败局无法挽回”而造成的。笔者认为,第十一军入侵贵州本身是一次超越上级意图的行动,它对撤退的时间和地点的选择,完全是根据它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具备的人力、物力条件来决定的。第十一军在制定作战计划时以黔桂铁路的终点独山,以及都匀附近的八寨作为终点,其原因在于:第一,向黔境追击的部队,即第三和第十三师团,总兵力比较单薄,深入到重峦叠嶂的贵州山地所冒的风险很大,所以,不易深入前进。第二,从第十一军自身的情况和条件来看,再延长追击路线是极为不利的。因为十一军自5月参加作战以来已近半年,日军史载:“在此期间,第一线将士忍受种种困难和物资缺乏之苦,突破酷暑、瘴疠地带,眼看已到冬季,仍着夏装,军鞋也已破烂不堪,而且为了躲避美机袭击,几乎全部在夜间行动,连日宿营于山野,一心只为完成任务而前进,如果再将追击目标延长,要付出更大代价,则必须有充分理由。”^①第三,贵州是四川南面的屏障,中国军队在日军深入黔境后不惜一切代价来进行防卫,以拱卫陪都。这样,第十一军所受的压力很大。部分中国军队英勇抗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造成了日军重大的伤亡,大大地阻碍了日军的前进,也是日军撤出贵州的重要原因。这一问题,在下文再详细论述。

二

1944年,日军在豫湘桂战场上,由北到南,连下长沙、衡阳、桂林、柳州,追击中国军队一直到黔桂边境。此时,贵州成为四川及重

^① 《广西会战》(下),第180页。

庆的最后屏障,日军入侵贵州,对重庆造成了很大威胁。当时,美国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向蒋介石提出:如果贵阳失守,美国为了自身和全局的利益,将不得不舍弃重庆而重点保卫中国战区的唯一补给基地昆明,中国应有再迁都的准备。在此前后,国民政府官员有主张迁都成都或西昌的。蒋介石自己在事后也承认,“自三合、独山及都匀之姬家桥相继陷入敌手,战况危急,不仅西南各省人心动摇,而英美有要求撤侨之事,益造成社会之惶惑不安”^①,“八年来抗战之险恶未有若今日之盛者”。^②

这种混乱慌张的局面,乃是因为国民政府对日军北犯贵州的判断和估计不足而造成的——先是对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够,使得日军连连得手,而一旦日军深入黔境后,又丧失信心,惊慌失措。

桂柳会战后,中国军事当局检讨认为:“在敌情判断上,亦忽视敌本身之严重性,因敌此时为撤退南洋一带之侨民,已迫其为必死之战斗,不能不行险以侥幸也。”^③8月上旬,衡阳失陷。当时,日军仅在雷州半岛,廉江以南有驻扎,中国军队此时的意图在于破坏南宁、玉林以南的交通线,对雷州半岛之敌坚壁清野,而固守黄沙河、全县、桂林、柳州一线,拒敌于此线之东;此线之西,由于对敌估计不足而被忽略,除扩修独山机场外,无任何部署。当然,这也有兵力不足的因素。至日军第十一军推进到了全县、道县一带,第四战区“置重点于湘桂路正面,而以确保桂柳为着眼,至于广东西江及桂南、桂西各方面,以无兵驻守,不得已,飭令各该区地方团队以及民众武力,严行整顿战备,以补救战区一时兵力之不足。”^④“桂西”即是黔桂省境以南地区,这时,第四战区已经注意到了该地区的防卫,但由于兵力捉襟见肘,该地区仍未得到足够重视。等到11月日

①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第1064页。

②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419页。

③ 秦孝仪主编:前引书,第680页。

④ 《抗日御侮》第9卷,第2358页。

军兵临桂柳城下后，第四战区仍为‘确保桂柳’采取‘攻势防御’，而未能‘及时修正，转取持久’^①，即未能部署至黔桂省境以南、黔桂公路沿线持久牵制敌人。一直等到桂、柳失陷，第四战区才决定：‘在宜山南北之线，调整部署，编组新阵地，继续阻击日军，以第二十七集团军在北，第十六集团军在黔桂路正面，第三十五集团军在南。’^②但战区配备尚未完成，敌已攻到。直到日军越过宜山打到怀远，张发奎才意识到日军‘扩张战果，逼近黔疆，亦非绝不可能’^③，然而为时已晚。日军终于把战火引进了贵州。

敌重兵压黔，陪都重庆震惊。国民政府提出了‘确保黔边，屏障陪都，相机击破敌人’的总方针，把滇黔划为一个战区，设滇黔战区贵州前敌总指挥部于贵阳，准备以贵阳为重点将日军堵截于黔桂边界，以拱卫重庆。蒋介石命令拟任盟军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贵州兴义人）坐镇贵阳，策划御敌；任命汤恩伯为黔桂边总指挥，协助张发奎阻击日军侵入黔滇。同时，蒋介石加紧往贵州调遣兵力。在日军突入广西的时候，贵州防卫空虚，只有石觉的第十三军。蒋介石用美军飞机，先运两个团到重庆，再用车运，赶赴前方应急。根据当时任贵州防空司令兼贵阳警备司令的宋思一回忆：“从10月初到12月这一段时间内，每天经过贵阳的部队，平均约在三五千人以上，多的时候，竟在几万人，总数约25万。”^④11月8日，汤恩伯到达贵阳，陆续调入贵州的部队有汤恩伯和胡宗南的第九十四、八十七、二十九、九十八、九、十三、五十七、九十七等8个军，约20万人。如前所论，这些部队的战斗力并不高，故而，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向蒋介石建议：“准备将在缅甸作战之五个中国师抽调两个师返国阻敌。”^⑤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国方面的同意，并且，中

① 《抗日御侮》第9卷，第2430页。

② 同上书，第2302页。

③ 秦孝仪主编：前引书，第669页。

④ 宋思一：《黔南事变前后》，《黔南文史资料》第7辑，第138页。

⑤ 《抗日御侮》第9卷，第2425页。

方还决定，“以后战局如再恶化，则必需将缅甸作战之远征军全部调返”。^①

这一兵力调遣是否合理呢？如果我们把当时的东、西两个战场联系在一起（东战场即豫湘桂战场，西战场即滇缅战场）就会发现，这一决策是缺乏远见的。

在西战场上，从1943年10月起，盟军即在缅北发起了对日反攻，1944年8月3日，盟军完全攻克了缅北重镇、滇缅公路和铁路的重要枢纽密支那，“缅北各个要点，遂而全入我军掌握”。^②继而，卫立煌的远征军攻克滇西龙陵、松山、芒市。正在缅北、滇西捷报频传，中印公路即将打通的紧要关头，抽调中国远征军回防黔桂，于滇缅战局是大为不利的。因为中印公路一旦打通，对华援助的渠道便会顺畅，于中国内地的作战极为有利，而且缅甸是日本南方圈的西翼屏障，该地区一旦易手，将对日本所占领的法属印度支那形成巨大威胁，日本所谓的“绝对国防圈”也将被进一步粉碎。因而，抽调中国远征军增援贵州的决定，于12月1日“以蒙巴顿抗议，忽告停止”。^③在桂柳会战结束之后，国民党战史著作也认为：“集中重兵于缅北、滇西方面，忍受桂、柳战场兵力之不足，而使缅甸方面之作战成功，打通中印公路，加强中、美联系获得大量美援，用以加强尔后反攻之准备；虽桂柳作战，遭受一时之挫折，但能达成牵制多数日军于中国战场之任务，其贡献于盟军之全面胜利者，实非浅鲜。”^④但毕竟这支援兵的取消，于贵州之防卫来说，是一大损失。

从以上贵州兵力的配备，我们可以看到，调防贵州的8个军，虽然战斗力不高，但与日军的两个师团相比，数量上占了绝对优

① 《抗日御侮》第9卷，第2426页。

② 《驻印军在缅北作战状况要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转引自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9页。

③ 郭廷以主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1938—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版，第323页。

④ 《抗日御侮》第9卷，第2429页。

势。如果说广西战场上对日兵力捉襟见肘的话,那么以 20 万大军对两个师团的日军,只要配置得当指挥有方,应当是绰绰有余的。但现实却是中国军队的保守战略,使得日军深入到了独山。

在日军进入贵州之前,何应钦拟定了一个防御计划,其概要如下:1. 主要防御阵地为乌江北岸迤盘江西岸沿线,固守此线,组成主要阵地,以阻止敌人前进,保卫重庆安全。2. 以贵阳市为据点,部署前敌阵地,掩护主阵地作战。3. 在马场坪设立阻击敌人的前进抵抗线,以消耗敌人的战斗力,迟滞其前进,巩固贵阳的部署。4. 黔桂边境,以南丹附近为主要掩护据点,组成掩护阵地,以掩护后方部署的安全。5. 以有力一部,进入桂林一带,机动作战,以迟滞敌人的进犯。6. 总司令部设昆明,贵阳为前敌指挥所。^①

由以上计划,我们可以发现,何应钦的作战计划中,对保卫贵阳并不存太大的信心。把主要防御阵地划到“乌江北岸迤盘江西岸沿线”,实际上已把贵阳远远地丢弃在外面。马场坪距贵阳仅 100 公里,在马场坪设立阻击敌人的前进抵抗线,只起到一个“消耗敌人战斗力,迟滞其前进”的作用,那么,马场坪一带一旦有战争,贵阳则必须提前疏散。实际上,国民政府本来就没有打算坚守贵阳。在何应钦还未到贵阳履任的时候,蒋介石就曾指示他,必要时放弃贵阳,退守乌江上游的鸭池河。特别是在因蒙巴顿的抗议,抽调中国远征军回防的计划流产后,蒋介石更加丧失坚守贵阳的信心。他“以局势等于绝望,决定如日军继续深入,即放弃贵阳,固守乌江”。^②何应钦所作的计划,正是遵照蒋介石的指示来制定的。当何应钦来到贵阳以后,张治中也赶到贵阳。他们在南明堂召集有关各方人士开会。会上,张治中极力主张在贵阳“坚壁清野”,“焦土抗战”,因贵州省参议会议长平刚强烈反对,才作罢。但尽管如此,会后,何应钦还找宋思一谈话,要他在必要时破坏电厂、纸厂、电报设

① 宋思一:《黔南事变前后》,《黔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7 辑,第 141—142 页。

② 郭廷以主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4 册(1938—1949),第 323 页。

备、各种军事物资及主要桥梁,同时,还指定一个美国军官会同他办理此事。

国民政府这种保守和丧失信心的表现,同样是对敌情估计和判断不足的结果。在广西战场上,由于没有估计到敌情的严重性,而使日军轻易进至黔边;而等到日军开进贵州之后,同样也是因为没有正确的判断,以20万兵力对抗日军之两个师团还惶然不知所措。

作战的指导思想决定了兵力部署。当时,中国军队的兵力部署概况是这样的:黔省主阵地方面,拟使用20万人守备,前敌指挥官为第三方面军司令汤恩伯,以石觉十三军,陈牧农九十三军,陈素农九十七军为基干,人数约10万。其他守备乌江主阵地的部分,另由胡宗南方面及其他方面酌调来黔(当时,调到贵州的军队,除汤恩伯直接统驭的部队外,尚有15个师亦先后到达贵州境内)。汤恩伯所作的具体部署是:九十四、八十七两军向黄平、镇远集结,侧击北犯黔南日军之右翼,并确保黄平、镇远地区,以利主决战方面作战;二十九、九十八、九、十三和五十七等5个军集结贵阳、马场坪、都匀、独山之间地区,担负击破进犯黔南之敌,以确保贵阳;原在南丹、河池间守备的九十七军,亦协同担任黔南作战。

按照这一部署,主要兵力分布在独山、都匀以北地区,黔桂省境线上,仅靠九十七军守备。陈素农的九十七军“系新成立,没有作战经验”^①,日军进攻南丹,陈素农“弃城逃命”,“遗失密本与通讯电机”^②,使得张发奎司令部遭到夹击。为此,张发奎及蒋介石都大为光火,尽管陈素农是蒋的嫡系,但还是遭到了惩处。陈素农此举动摇了中国军队的阵线,日军左路第十三师团刚好利用这一机会冲进了黔境。

① 宋思一:《黔南事变前后》,《黔南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43页。

② 蒋介石查办第九十七军陈素农在南丹弃城逃命遗弃密本有关电文》,《黔南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351页。

三

日军侵入贵州，一度占领了独山，打到都匀附近的姬家桥，达到了预定的目的，按预定计划很快撤出了贵州，所以对于中国军队来说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黔南大捷”。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应当看到，日军的企图并没完全得逞；一些中国官兵在战斗中英勇抗战，仍然有力地阻挡了部分日军的进攻，表现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

日军第十一军是分三路进入贵州的：西路为第十三师团，沿南丹—麻尾—下司—上司—独山一线进犯；中路为第三师团的主力第三十四联队，沿思恩—黎明关—荔波—独山一线进犯；东路为第三师团第六联队，沿宜北—八寨—都匀一线进犯。

在三路日军中，东路几乎未受到任何正规军队的阻击，顺利地打到了都匀附近。中国军队在这一线未作任何部署。

西路第十三师团的进攻也比较顺利。日军进入贵州省境后，根据日军第五航空军直协队的侦察，“在南丹—独山道路上的敌军大部正在溃退”，“重庆军退却也很混乱，在路上遗弃很多汽车，山炮等物品”。^①中国军队遗弃的大量物资，大大地缓解了日军补给不足的状况。日军曾在黔桂铁路上缴获过中国军队满满一列车的军需品。另外，独山地方的警备机关也表现出了怯懦无能。11月28日，日军还远未到达独山的时候，领中将衔的都匀、独山警备司令韩汉英就在独山实行了“焦土抗战”，破坏了独山设施，之后仓皇逃命。韩汉英此举，使得独山城及独山百姓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更使日军轻易地“无血占领”了独山城。^②

① 《广西会战》(下)，第190、195页。

② 独山县参议会：《独山沦于日寇惨遭空前浩劫之经过》，《贵州档案史料》1987年第2期。

但这条战线上,也有部分中国军队英勇作战。在距离独山 30 公里的黑石关,中国军队王铁麟九十一师英勇抗击,日军遭到了很大的打击。据 1944 年 12 月 5 日的《新华日报》报道,是役九十一师“毙敌四百二十名,夺获轻机枪十四挺,步枪一百三十支,及其它军用品”。次日,该报又报道:“我军于甲涝河以北,独山以南之间与敌战斗,迄至四日晨,击毙伤敌五百余。”

在阻击日军进入黔境的战斗中,中路的抗战是最为英勇的。日军负责中路追击的是第三师团主力三十四联队,其作战能力比较强,第三师团司令部随该联队前进。但三路日军中,这一路的进展却最为缓慢和不利。第十一军司令部原计划中路沿思恩—社村乡—黎明关—荔波一线,进抵独山,与第十三师团会合。但是,第三十四联队 12 月 4 日 1 时接到军司令部的返转命令时,才刚刚艰难地夺得荔波。这正是中国军队英勇抗敌的结果。所以,如果说黔南作战中,中国军队取得过什么胜利的话,那应当是在中路。但是,关于中路抗战的情况,在仅有几篇关于黔南作战的文章中,却从未有人研究过。

中路战场,主要有黎明关之战、洞塘之战、穿洞之战几次大的战斗。在这几次战斗中,中国军队都表现出了英勇顽强的气概。守备黎明关的是中国第七十九军一九九师五八七团,团长周国仲,全团官兵共 1800 余人。进攻黎明关的是日军第三师团主力步兵第三十四联队三个大队的两千多兵力。战斗从 25 日打到 27 日,整整两天两夜,惨烈空前。中国军队的奋勇阻击,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据日本人的记述:“重庆军向我进路进行纵射和背射,一挺一挺的重机枪和轻机枪,难以对付。而且还遭到可能有大量炮弹的迫击炮从后面猛烈射击,联队的苦战难以形容。”^①在攻下黎明关以前,日军第八中队长竹秀山中尉和第五中队长天野松义中尉相继负伤。日军攻下黎明关之后,“(第二)大队的各中队长非死即伤,由吉

① 《广西会战》(下),第 193 页。

勇寿南、东尾浩一、渡边总一郎等少尉分别代理第五、第六、第八中队长。不久东尾少尉、胜山少尉也先后负伤，渡边少尉又战死。日本士兵有5名战死，伤者不计其数”。^①这场战斗打到最后，是由于日军抓人引路，走山路来包围黎明关，中国军队才被迫撤退的。^②

黎明关失守后，周国仲团且战且退，先后从必同、懒板凳、永康乡等地向荔波方向退却。在谭家坳、刘家坳，由思恩经大哨坡撤至洞塘乡的杨森所率领的二十军、二十六军与周国仲团联合阻击尾追日军，又激战一天一夜，“打死日军四十多人，打伤近百人”。^③30日深夜，日军进抵蒙家坳，中国军队利用险要位置竭力阻击，“日军死一百多人，伤六十多人”；12月1日下午，日军再次进攻蒙家坳，又伤亡一百五十多人。^④日军记载：“步兵第三十四联队于11月27日攻下黎明关，冲入贵州省后，经板寨（黎明关西北六公里）于29日上午攻击洞塘（板寨西北偏北10公里）北方高地的重庆军，其第五中队（代理中队长吉勇寿南少尉）于正午占领了洞塘北面的石山。此时，第二大队的各中队只剩下大约三十人，第八中队长已由曹长代理”，“重庆军除撤退下来的兵力外，似有新增援的部队，利用险要地形进行顽强抵抗”。^⑤

12月2日，日军开始进攻永康穿洞，在此阻击日军的中国军队，主要是杨森二十七集团军第二十六军丁治磐的后卫部队。中国军队据洞坚守，双方激战近两天，日军非但毫无进展，而且被击毙上百人。日军见险关难攻，一方面佯攻穿洞，另一方面三十四联队长二神大佐命赶来的第一大队迂回左侧小路，出朝阳攻荔波县城。12月3日上午，迂回小路的日军进到八烂—平坡一带时，遭到从

① 《广西会战》（下），第193页。

② 蒙明儒：《记国军在荔波抗击日军的几次战斗》，《黔南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06页。

③ 荔波县政协文史办公室：《黔南事变中的荔波》，《黔南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57页。

④ 同上。

⑤ 《广西会战》（下），第197页。

南丹里湖退回的杨森部五十八军伏击，被击毙不少，剩余日军突破阻击，进入荔波。是役，日军第八中队伤亡极为惨重，据日军记述，中队“全体军官非死即伤，而由军士担任队长继续奋战。在大道前方的石山中央有个凿成隧道的洞穴（即穿洞——笔者），是通荔波的唯一进路，前方的石山均被重庆军占据，并以重机枪和迫击炮、掷弹筒等雨点般地射来。12月3日，担任攻击的第二大队（大队长竹下喜兵卫大尉）即使拿出全部兵力也只有步兵一个中队，17时10分在第一中队的速射炮旁落下一颗迫击炮弹，小队长横心佐嘉夫少尉等全部战死”。“由于重庆军多为自动火器，经常迅速移动，其士兵战斗动作又非常机智敏捷，所以很难发现敌军火器”，“在12月2日第六中队武智通夫少尉，第十中队石川音吉中尉战死，第五中队代理中队长吉勇寿男少尉负伤。12月3日，第五中队能行动的官兵共14名”。^①

日军虽然最后占领了荔波，但伤亡惨重。按照侵华日军的编制，常设四单位制的驮马师团中，一个步兵中队有194人，而在进攻荔波的三次大的战斗中，每一次日军都要损失上百人，洞塘一战，第二大队的各中队只剩下大约30人，而穿洞战斗之后，第五中队能行动的官兵只剩下14名。军官的损失更为惨重，中队长起初是中尉担任，中尉死后由少尉代理，少尉没了由曹长代理，打到最后，甚至只能由军士来指挥战斗。非但是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使日军损失惨重，天气也使日军受到损失。日军入侵贵州的时候，正是冬季，在这海拔一两千米的高原，日军还穿着单衣。陈诚在向参政会报告军政的时候曾说：“（日军）被服不足，已有冻毙者。”^②由于死亡惨重，连处理死亡士兵的尸体都成了日军的难题，在撤退时，“为了处理死者尸体，各队官兵是经受无法形容的困难才退下来

① 《广西会战》（下），第201页。

② 1944年12月9日，《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卷六十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的, 骨灰盒最初是木箱, 随后改为饼干袋, 再后为空烟盒, 最后只得将骨灰装空的火柴盒”。^①

黔南作战中, 中国军队作了英勇抵抗, 日军虽遭伤亡, 但仍顽强作战, 攻占一座座城池据点。其原因之一, 是中国军队在山地狭谷中只能集中兵力专守一处, 而日军却可以分几路进攻, 并迂回包抄。在向荔波进攻的三次战斗中, 日军的这种战术, 使中国军队吃尽了苦头。一位参加黔南作战的‘嵩山部队’的中国军人曾说: ‘敌寇这次侵湘犯桂而入黔, 一贯战法是迂回包围, 他正面攻不下, 就由侧迂回到我们后面, 我们一个据点防御得坚固, 他无法攻陷时, 他就先打附近的小据点, 使我们孤沦在重重包围之中, 补给断绝, 就难以久持。’^②

黔南作战使日军占领中国国土达到极限。这是已成为强弩之末的日军的回光返照。黔南之战后, 日本在战略上的弱点暴露出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曾叹道: ‘南方军屡经苦战, 前途堪虑, 国内情况虽不详, 但财政困难当属无疑。’^③ 而对于中国军队来说, 豫湘桂大战以来, 严重溃败的正面战场终于守住了阵线, 黔南作战成为正面战场的重要转折之一。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 荣维木)

① 《广西会战》(下), 第 206 页。

② 严正路: 《黔南新战地》, 《黔南之战》, 1945 年版, 第 9 页。

③ 冈村宁次回忆录》, 第 248 页。